

史天健研究的時空雖然是十餘年前的北京，但其結論並未過時：如果國家力量不從私人生活領域中退出，如果沒有一支中立、理性的官僚隊伍出現，如果不鬆動單位體制對資源分配的控制，公民政治表達方式是很難擺脫傳統主義進入現代法治體制運作模式的。

個行動的形式去游說單位領導；另一方面，由於資源分配直接影響到公民的日常生活，加入這樣的利益爭奪幾乎成為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公民參與政治不再要求具有理解政治運作、建構政治與私人生活的聯繫以作出理性選擇的能力。在中國的制度背景下，此類聯繫因為與個人私利直接相關而變得顯而易見，且不論各自的教育、社會經濟地位等因素。因此，中國人可以而且必須更多地以個人形式參與到「低層次政治」中來。

該書通過對實證資料的剖析，表明當今中國政治參與，無論是形式、特徵、所需的資源等都深深根植於現行體制之中，這也是作者反

覆強調切入分析中國政治參與的出發點。北京的政治參與遠比想像中積極和多樣化，這在一定程度上挑戰和矯正了西方的政治動員理論對社會主義國家公民政治參與的解說。而且此項研究對當下中國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史天健研究的時空雖然是十餘年前的北京，但其結論並未過時：如果國家力量不從私人生活領域中退出，如果沒有一支中立、理性的官僚隊伍出現，如果不鬆動單位體制對資源分配的控制，公民政治表達方式是很難擺脫傳統主義進入現代法治體制運作模式的。進一步講，經濟改革並不能天然促成這些條件的形成，我們還是期待政治改革的同步並舉。

## 尋訪「延安道路」的遺迹

### ● 董國強



賽爾登 (Mark Selden) 著，魏曉明、馮崇義譯：《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賽爾登 (Mark Selden) 撰寫的《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一書，是第二代西方學者關於中共黨史和近代中國革命史研究的扛鼎之作。本書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作者在探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起源和抗戰時期中共政策的戰略轉變等問題時，

自覺地摒棄了西方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種種干擾，始終緊扣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以社會史的廣闊視野和嚴謹細緻的實證方法立論，創建了一種新的研究範式。它的影響從1970年代初流傳至今，實際上構成歐美學界「中國研究領域」的一種新流派。

為了挑戰當時(1960年代)西方學界頗具代表性的幾種片面觀點——如「現代化引發革命說」、「蘇聯輸入革命說」和「民族危機導致革命說」等等，作者特別選擇了地理相對蔽塞、自然生態十分惡劣、社會經濟極端落後、近代教育文化事業很不發達、抗戰期間又倖免於淪陷的陝北根據地作為研究論述的主要對象。他所依據的研究材料，部分來自美國、台灣、香港、日本等地收藏的中共檔案文獻，部分來自第一代西方中國問題觀察家的著述，部分來自革命戰爭年代中國人的大量著述——其中，他還特別提到毛澤東、費孝通等人的著作對他的影響。

本書正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概述清末民初陝北地方的社會經濟狀況，旨在揭示中國革命的社會歷史根源。作者依據大量不同來源、不同類型的史料，指出軍閥混戰、地主盤剝、苛捐雜稅、自然災害、盜匪橫行等多種因素的交互作用，導致當地自然經濟生態的破壞和傳統農村社會的解體，廣大貧苦農民走投無路，為中共領導的革命提供了乾柴烈火。第二章記敘陝北根據地的創建歷史。其中對劉志丹等人的傳奇經歷和中共黨內權力鬥爭秘聞

的描述，客觀上構成本書的一大重點。他關於劉志丹早期個人革命經歷的描述，旨在揭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本土化特點；而以劉志丹為代表的地方游擊隊領導人與外來領導者之間的種種糾葛，本質上是基於務實的經驗理性的戰略指導思想與基於主觀意願的教條主義之間的較量。作者的研究論述表明，劉志丹等人領導創建的陝北根據地，與毛澤東等人領導創建的江西井岡山根據地，長期以來相互隔絕，獨立發展，但是他們遭遇的困難和採取的對策卻極為相似。這實際上論證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普遍意義。由此看來，1930年代中後期中共內部「本土派」取代「國際派」執掌革命的領導權，既是必然，也是合理的。

本書的主要內容是論述1940年代「延安道路」的成因、內容和意義。第三、四、五、六章便是圍繞這個主題展開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儘管作者坦承曾經從毛澤東等人的著述中獲得靈感，但是他關於「延安道路」的理解和詮釋，依然帶有顯著的個性化特點。

首先，在作者進行相關研究和寫作時，國際社會正處於越戰所引發的深刻危機之中。身為美國人的作者，當時所關注的重點問題並不是中國革命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關聯。他是把中共創建的「延安道路」放在反對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背景中來論述和評價的。他通過研究一個根據地的起源以及它的政治和經濟，探討一些對全國以

賽爾登的《革命中的中國》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作者在探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起源和抗戰時期中共政策的戰略轉變等問題時，自覺地摒棄了西方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種種干擾，始終緊扣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以社會史的廣闊視野和嚴謹細緻的實證方法立論，創建了一種新的研究範式。

本書作者在研究和寫作本書時，國際社會正處於越戰引發的危機之中。他身為美國人，當時關注的重點並不是中國革命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關聯，而是把「延安道路」放在反對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背景中來論述和評價，想通過研究一個根據地的起源及其政治和經濟，探討一些對全國以至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義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至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義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因而，他力圖通過實證研究和客觀描述，向讀者展示「延安道路」的具體內容及其表現形態，而對於由不同意識形態之爭所引發的那些抽象的理論問題——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謂「馬列化」還是「化馬列」問題——則基本沒有涉及。

其次，從廣泛的社會革命和政治制度轉型的視角出發，而非從狹隘的黨內權力鬥爭的視角出發，作者拒絕將「延安整風」看作一場政治清洗運動。他認為「本土派」對「國際派」的清洗只是「延安整風」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插曲，而且這個清洗早在1939-40年間便已完成。他強調1942-44年間大張旗鼓進行的「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共為了應付由日寇瘋狂「掃蕩」、國共軍事磨擦和根據地財政經濟危機等所引發的種種現實困難而開展的。它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根據現實的需要與可能，努力調整根據地的黨政關係、黨群關係和經濟發展戰略，在殘酷的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中求得自身的生存與發展。

作者認為：革命領導者能否在貧困而屢遭蹂躪的鄉村創造性地解決貧困、不平等和落後問題，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中共在根據地實施的普遍選舉和「三三制」政治改革，集中體現了「民主」的訴求，大大激發了民眾政治參與的熱情；精兵簡政、幹部下鄉、軍隊和機關的大生產運動，則集中體現了「平等」的訴求，不僅緩

解了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危機，而且有助於克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幹部腐敗；抗戰前實行的土地改革和抗戰時期實行的減租減息、稅制改革等社會經濟政策，則集中體現了「公平」原則，為根據地經濟發展注入了新動力。他還特別指出，通過減租減息、稅制改革和互助合作等方式實施的「靜悄悄的革命」，應該被視為中共的一大創舉，它是傳統的「土地革命」方式以外實現社會經濟利益再分配的合理有效途徑。通過上述這些積極的措施，中共巧妙地實現了共產主義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改造運動的對接，最大限度地吸引了中國社會各階層民眾的支持。與「國統區」和「淪陷區」相比，中共領導的各根據地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人民團結。結果，中共不但在十分不利的環境中生存下來，而且最終在全國取得勝利。

從經驗理性而非教條主義的觀念出發，作者強調中國革命道路所包含的本土特色非但不影響人們對它歷史價值的評估，相反，這正體現了中共的務實態度和非凡的創造能力。延安時期形成的「群眾路線」——如以群眾政治動員取代僵化刻板的官僚行政體制；通過自力更生、因陋就簡、加大人力資源投入等「土辦法」克服因資金、技術不足等因素造成的經濟發展障礙；通過確立人民戰爭的戰略指導思想和以游擊戰、運動戰為主要作戰手段，有效改變中共軍隊在數量上和武器裝備上的劣勢，等等——都是

「窮則思變」的產物。這些在現代化理論和正統馬列主義觀點看來不可思議的做法，卻是當時歷史條件下唯一合理的選擇。他還認為，本書所述的「延安道路」的意義是超越戰爭年代的，應該在後殖民時期的革命和建設中不斷發揚光大。

基於以上分析論述，筆者認為作者對「延安道路」的理解和詮釋十分新穎獨特。讀完該書之後，不管你是否同意作者的觀點，你都無法忽視它的存在。我認為，作者通過扎實的實證研究所做出的那些分析與評判，比起那些純粹從意識形態需要出發的膚淺、空洞抽象的看法和解說（無論頌揚還是否定「延安道路」）都更有價值，也更能經受時間的考驗。本書在初版發行二十多年後再版這個事實，就充分表明了中外學界對其學術價值的肯定。

不過，同任何一部優秀的學術著作一樣，本書也並不是完美無缺的。在該書初版寫作的過程中，作者與他同時代的許多傑出西方中國問題觀察家一樣，也受到時代和研究條件的局限。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他們當時無法到中國實地考察，無法確切了解建國以後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如三大改造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具體細節。因而，他們無法運用經驗和常識對他們的理論研究成果進行必要的校驗。他們的主觀善意，有時也會導致對某些歷史現象的誤讀。

關於這一點，作者自己也有着清醒的認識。

本書新版的「前言」和「後記」是本書不容忽略的重要構成。它們集中反映了作者在初版發表以後二十多年來對其核心命題和主要觀點的反思。我們在閱讀該書六章正文時所產生的一些疑問，可以在這裏找到一部分答案。

在長達三萬多字的新版「後記」中，作者特別提到「民主與專制」問題。他依據近二十多年來不斷湧現的大量相關研究成果，努力向讀者揭示「延安道路」的另一個側面。作者對「王實味案件」所做的多維度、多層面的分析，大大修正了初版關於「延安整風」的方法與效用的評估。他指出用「思想改造」的方法取代「開除」和「處決」，雖然體現了某種歷史的進步，但並未造就真正的黨內民主。黨內高度的思想統一不但是意識形態灌輸教化的結果，同時還伴隨着嚴密的組織手段和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壓威懾。在「思想改造」無法奏效的情況下，誅殺異己依然是必要手段。其次，「延安整風」並未真正按照「民主」原則理順「黨的領導」與「群眾路線」的關係。延安時期的民主主義萌芽只不過是中共所支配的群眾路線和政治動員的組成部分。廣大民眾的政治參與因缺乏制度的保障，顯得十分有限和脆弱。而在後來的歲月中，正是這種畸形的群眾路線構成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嚴重障礙。此外，以政治動員取代官僚行政體制（現代憲政法治意義上的）的弊端，在毛澤東晚年——特別是在反右運動、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

作者強調，延安時期形成的「群眾路線」、以「土辦法」克服經濟發展障礙、確立人民戰爭的戰略指導思想等等都是「窮則思變」的產物。作者對「延安道路」的理解和詮釋十分新穎獨特，但受到時代和研究條件的局限，當時無法到中國實地考察，無法確切了解建國以後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具體細節，因而無法運用經驗和常識校驗他的理論研究成果。

的政治清洗、個人崇拜、高壓政策和操縱行為中暴露無遺。

作者最後指出：集權主義、思想專制、原教旨主義、領袖個人崇拜、運動群眾等問題代表着「延安道路」的陰暗一面，它們與我們過去強調的嚴謹務實、精誠團結、艱苦奮鬥、自我犧牲、救國救民等形象同樣真實。只不過在戰時狀態下，由於受到各種主客觀條件的制

約，「延安道路」的光明面始終佔據着主導的地位。

筆者認為，作者在新版中所作的這些修正與補充，使我們對「延安道路」的理解更全面、更豐滿、更真實。同時，它也很好地回答了以下問題：為甚麼中共大力倡導的「延安道路」，會在戰爭年代和建國以後導致兩種截然不同的結局。

## 評宋敘五《西漢貨幣史》

### ● 趙善軒

《西漢貨幣史》最大長處，在於分析西漢貨幣問題對中國經濟思想史所造成的影響。著者指出西漢貨幣政策歷次改變，形成了中國傳統貨幣思想的特殊性格。漢文帝時開放鑄錢，不依法鑄錢者大增。當時人認為放鑄使得富豪藉鑄錢致富，導致社會財富不平的惡果。



宋敘五：《西漢貨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

筆者曾經在香港三聯書店1994年出版的《當代香港史學研究》一書中，看過一篇介紹秦漢史研究的文章，文中提及《西漢貨幣史初稿》一書，並將之推許為香港第二代秦漢史研究中的重要著作之一。近得知該書已經再版，故先睹為快。據該書著者（下稱著者）自言，《西漢貨幣史初稿》係由已故經濟史權威全漢昇先生所審閱及推薦，1971年經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近年經著者重新修訂，把原來的十章增為十一章，刪去「初稿」二字，於2002年再版。正如著者所言：「本書是極少數將中國貨幣史作斷代研究的著作。」這因為「西漢是中國社會第一個政治性的統一政府，而且